

P.Feyerabend (1924-1994) 的後現代研究 方法論戰對教育的啟示

張天泰* 張淑媚**

摘 要

Paul Feyerabend (1924-1994) 為奧地利的科學哲學家，在 1975 年出版《反對方法》(Against Method) 一書後，其中提到具爭議性的「怎樣都行」(anything goes) 觀點，引起其他學者的質疑與挑戰，Feyerabend 本人則提出回應。本文運用理論分析法(theoretical analysis method)和辯證法(dialectics) 梳理文獻，其目的在討論與分析這場研究方法論上的論辯，而研究結果為釐清學界對 Feyerabend 多元主義方法論的誤解，詮釋其多元主義方法論的價值與重要性，最後並提供其理論對教育研究者與教學者的啟示。

關鍵字：後現代主義方法論、怎樣都行、費若本

誌謝 本文係張天泰主持 2019 年度重慶市教育科學項目”高校教師公共性理論建構與實踐探索”(2019-GX-415)，階段性成果，特此致謝。

* 第一作者：長江師範學院教師教育學院講師

** 通訊作者：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Email : knightchang24@gmail.com

投稿日期：107年6月1日；修改日期：109年4月24日；採用日期：109年6月19日

壹、緒論

後現代主義是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一股反西方現代性哲學體系的思潮，除影響著文學、藝術等方面的表現方式外，也在社會科學的學術理論上，產生相當巨大的衝擊，教育科學理論是社會科學理論的一支，同樣地受到影響。楊深坑（1996）曾表示：

當現代化運動席捲全球，成為全球一致的訴求時，一股反統一化的後現代主義思潮也逐漸興起，反對現代化運動下的歐洲中心、理性中心的思想，對現代性所持「後設敘述」(metanarrative) 所隱含的集體主義、否定各種地方性、局部性敘述所包括的文化認同等觀點，提出嚴厲批判。(頁 166)

而後現代思想的誕生，正是對現代思想與理性思維一種重新凝視與反思的呈現，植基於此，後現代更被直接明白描述為「對立與挑戰的時刻」(the moment of contraction and challenges) (Usher & Edwards, 1994)。

Torsten Husén(1916–2009)認為後現代主義最早源於藝術領域。他提到後現代主義興起於 1930-1940 年代，1934 年由西班牙作家 Federico de Onis(1885–1966)在藝術界最先使用「後現代主義」一詞，Dudley Fitts(1903–1968)在 1942 年出版《當代拉丁美術詩選》時，再度使用此詞。50 年代黑山詩派的理論家 Charles Olson(1910–1970)，對「後現代主義」特徵做了歸納，指出後現代主義有異於正統現代主義，重視描寫現代現世的生活經驗，主張不講格律的開放體，由於後現代主義傾向在藝術方面表現出多元複雜的面貌，所以評論家們對後現代主義的看法人言言殊，有人認為後現代主義，是注重藝術題材的社會性，是要回到更富有人性的藝術，有人認為後現代主義是現代主義合於邏輯的發展，是現代主義超越自己而走向自我否定的進階發展，是與時代同步(何政廣，1994)。此派藝術家主張由創造性想像主導藝術創作，因此，秉持後現代精神的創作比現代主義更具內容的不確定性，在內容的隨意性、不連貫性、矛盾性，在非情節、非人物、非結構以及表示世界的不可解釋性等方面，甚至超越了現代主義(何政廣，1994)。

而後現代主義的起源從建築學來看有另一說法。1972 年 3 月 15 日位於密蘇里依照 CIAM 國際現代建築會議中，提及最先進建築概念的現代建築布魯特-伊果(Pruitt -Igoe)

在被炸毀後，Charles Jencks(1939 – 2019)宣佈現代主義建築在 1972 年 3 月 15 日下午 3:32 分死亡，從 Robert Venturi、Jencks 等人提出建築除了機能向度外，應加入歷史、文化、敘事各種向度的多元考量，此種論述喚醒了大家對於建築的象徵意涵、文化意涵的沈睡記憶，後現代主義建築應運而生（老俄，1988）。

後現代建築學在反抗一種大一統的現代主義論述，企圖呈現的是「一種對於國際式樣的反撲」，因為人類在工業革命之後，國際現代建築會議（C.I.A.M）一連串大力提倡現代主義建築，產生了「國際式樣」的潮流，然而這種強調一致的全球性現代主義建築，過度強調理性主義、機能主義，助長現代主義物質化的過度膨脹，卻忽略了人類與自然、與歷史的情感連結，在建築裡缺少人文意識的覺醒。所以後現代主義建築是對現代主義建築的一種延續，在延續的同時並對現代主義建築提出全面性的質疑反思、批判對話，後現代主義建築的興起，彰顯的是人類社會多元理性、多元價值與多元文化發展，而不只是被大一統的單一理性所獨佔、所限制。

1960 年代之後，後現代主義在文化的興起大幅影響各領域的思考模式，從藝術、到哲學、建築、甚至在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都深受影響。在研究方法論上，後現代主義一方面包容與兼用各種研究方法取向，同時也對這些既有的方法取向提出質疑，而非過往全然盡信現代性單一理性權威。誠如 Richardson (1994)所言：

後現代主義並不機械地排斥傳統獲得知識的方法，認為它們是錯的或不適用的。它打開一扇門，讓標準方法發展出新方法，而新的方法也是必須接受評論。後現代主義者公平地懷疑所有方法的真實性，沒有一種方法是可以擁有特權地位。(頁 517-518)

後現代主義這個思想風潮已動搖了現代思想的整個體系架構，它挑戰了許多以往被視為相當重要的假設、方法、態度、思考的模式，以及種種價值（Noddings, 2007）。

總體而言，後現代主義思潮再三強調，應平等尊重人們各種不同觀點的多樣性，並傾聽每個人的故事（Knight, 2008），後現代思潮特別看重凡事講求差異的敘述知識觀，一再指出每個人都有詮釋事物、批判或創造事情的知識權，這種觀點與 Paul Feyerabend (1924-1994)多元主義方法論是相呼應的（王秋絨，1997）。Feyerabend 在 1924 年生於奧地利的維也納，1994 年卒於瑞士的格諾里爾，享年 70 歲，他被認為是

科學哲學家，在科學哲學這個領域當中有「頑童」(l'enfant terrible)之稱，也是 20 世紀科學哲學史上最戲劇化以及最有趣味的哲學家之一，另一方面，Feyerabend 可說是思想上的領導人，把科學從一元思維的權威拉下殿堂，並且鼓勵各種文化之間的多元發展，為當代不可忽略的一股後現代思潮（洪子偉、郭敦民，2019）。Feyerabend 在 1975 年出版《反對方法》(Against Method)一書，主張其多元主義的方法論，甚至提出在研究方法上「怎樣都行」(anything goes)觀點，引起其他學者的質疑與挑戰，Feyerabend 本人則多次予以回應。本研究欲聚焦於 Feyerabend 主張「怎樣都行」的這場論辯。從 Feyerabend 的多元主義方法論談起，進一步提及這場論辯中 Feyerabend 的回應，目的在釐清學界對 Feyerabend 多元主義方法論的誤解，詮釋其多元主義方法論的價值與重要性，最後並提供其理論對教育研究者與教學者的啟示。在本文的論述上，採用理論分析法(theoretical analysis method)和辯證法(dialectics)，理論分析法是藉助古今中外思想家的教育理論，及融合分析者的教育理念作為分析的論據，為現實的教育問題提出反省思考與問題解決策略，而辯證法方面則運用黑格爾辯證法中正、反、合等論述方式來進行探究。

貳、後現代主義方法論

後現代主義論者觀察到現代主義的思維邏輯，總是企圖透過觀察「現象」來發現隱藏其後的理論「本質」，並將其視為普遍真理和認識的最終任務。然而，這種千篇一律的固定方法與機械模式，從後現代主義論者眼裡看來是無趣、荒謬且不可理解，而現代主義思維邏輯的做法，是單方面遵從形式理性，卻避開自實質理性的質疑，完全忽略了現象與本質是雙向互動的關係，大量現象出現產生量變將會讓本質產生質變，現象與本質不是單向式、固定線性化的互動關係，相對於現代主義追求的單一真理，後現代主義的方法論是無政府主義(Anarchism)，它們有如許多「小」而「美」的政府，允許相異的方法各自運作、互助合作，以發揮更大的力量，每一種研究方法需視現實需要而定，並不能說贊成 A 方法的存在就否定 B 方法使用的合法性，也有可能是兩種方法重新融合，而成為另一種新方法出來，所以後現代主義並沒有堅持單一的方法論。像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的系譜學(genealogy)；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的解構(deconstruction)，均可視為後現代主義方法論之一。Foucault、Derrida 等思想家分別以系譜學分析、解構方法來瓦解了現代主義論者認定的絕對性與

普遍性，舉例而言，課程學者 Pinar 和 Grumet 在 1970 年代，投入課程即現象學文本的研究，以現象學的「還原」方法去追溯 curriculum 的拉丁文字根「currere」，其意義為「在跑道上跑」(Pinar&Grumet, 1976)，而 Pinar 與 Grumet(1976)認為「在跑道上跑」是自我對於本身經驗的探索，是個體在這世界的自我經驗發展過程中與自我的關係，Pinar 曾用隱喻的方法描述這自我反思的過程「我在水面上看見我的思考像是氣泡般，從池塘的底下浮上來，他們表達了我們存在的深層結構」(Pinar&Grumet, 1976, 頁 51-54)；但後現代課程論者看到「currere」的侷限性，因 Pinar 是白種人，所以會去追尋自己西方文化的源頭，進而將課程視為在跑馬道上奔跑的進程。但在另一不同時空情境脈絡下，加勒比海地區的黑人文化中，不是用跑馬場、在跑道上奔跑來形容課程一詞，而是用其文化情境中，某類植物有毒的箭狀花蕊來作為課程（curriculum）的象徵；換言之，在現實中像這種之前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嘗試把它重新放在不同的歷史、文化與特定的情境中去看它是如何被論述表現出來，著重運用特定歷史文化情境脈絡做事務的討論，這就是後現代主義方法論的重要核心精神之一(Cole & O'Riley, 2002)。

後現代主義方法論無法由單一「無政府主義」名詞所能侷限住，如 Feyerabend 所言，

「科學是一個本質上無政府主義的事業：理論上的無政府主義比其法治秩序更為人文主義，才有可能鼓勵進步。」(Feyerabend, 1975, 頁 9)。

Feyerabend 多元主義方法論是在後現代主義方法論的時代背景下所發展出來，他認為科學並非一般大眾所認定必定是絕對理性的化身，科學和非理性二者關係並非完全二元對立，也正如後現代主義認為後現代社會是多元的、變動的，沒有唯我獨尊的絕對真理，沒有唯一的集權中心，受到後現代思維的影響，Feyerabend 強調一種尊重多元、歡迎差異，反對既有主流文本，對抗既定知識合法性地位，彰顯邊緣化知識，追求多元創新的研究精神，以下則詳論 Feyerabend 的多元主義方法論。

參、Feyerabend 多元主義方法論

Feyerabend 在 1975 年出版《反對方法》，提出他對現代性科學方法的批判與省思。他在序言指出，「第一世界科學只是眾多科學中的一種」、「科學可以有許多種」的

立場 (Feyerabend, 1975, p. iii) , 也呈現知識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思維, 主張所謂「怎樣都行」的論點, 而他提出的「反對方法」, 是反對固定不變的研究方法論。以下分別陳述他對第一世界科學(西方科學)理論的批判觀點, 再引入他的研究方法論意涵。

一、對西方科學理論的批判

Feyerabend 看到西方近代科學的理性理論, 常使用「證實」或「證偽」等合理性標準, 追求理論與事實的一致性 (consistency) , 在此原則指導下, 這類型的科學會流於只發現一些新事實來支持, 或修改現存理論, 這是優勢, 卻同時是限制。Feyerabend 從人類科學歷史發展的軌跡進行歸納, 他發現科學內部不存在任何具有普遍意義的方法論規則, 因為一致性原則的經驗論和歸納論, 雖然提高理論的嚴謹性與普遍類推性, 但是卻會對其他的新假設、新理論帶來壓迫性與絕對限制的負向效應。所謂「正確」的理論, 是在否證的基礎上對既有理論進行選擇而產生的, 也就是說, 那些宣稱正確的理論建立在把已經驗證過的、而且被否證的理論予以排除的基礎上, 然而這些被排除、被否證的理論可能未必是完全錯誤的, 而如果輕易把這類被否證的理論從選擇中排除, 可能會因此丟失科學的真理, 因而, Feyerabend 看到一致性原則的有限性, 也由此推衍出其多元主義的方法論。

二、「怎樣都行」的多元主義方法論

Feyerabend 認為西方號稱理性的研究方法論有其侷限性, 其侷限性來自於邏輯所要求的「一致性」, 也是絕不允許存在矛盾的現象, 當形式邏輯對於「一致性」的要求過於嚴格, 會「扼殺邏輯推論的生命力」, 在發展科學道路上, 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一普遍有效的方法。他進一步在《反對方法》一書中主張「多元主義方法論」。他提到:

「科學發展史上唯一不妨礙進步的原則, 在人類發展的各個階段, 只有一個原則確定要得到保護, 就是「怎樣都行」的原則。」 (Feyerabend, 1975, 頁 14-15)

他企圖打破一切研究教條式的規範, 提出將科學、神話、傳說等量同觀的世紀革命性的論述。認為研究方法論不該定於一尊, 也並非科學至上, 沒有最好的研究方法, 而是針對具體情況、具體問題並在實際使用過程中找尋適合的方法, 方法論並不獨立

於它們所存在和被運用的環境，他認為我們需要保留現有事實，也同時保留與現行普遍的科學理論不一致的新理論，並引進新觀察，通過理論競爭、反駁、辯證，才能推動科學繼續向前，故 Feyerabend 為了讓新理論得以有增生的空間，他提出了「反規則」、「反歸納」，「反對絕對信仰一致性原則」的經驗論、和歸納論的理論策略。在歸納論的理論策略上，Feyerabend 相信黑格爾辯證法（Hegelian dialectic）可以提供新的思考路徑，從各種矛盾的理論中反而可以提出更大視角超越性的觀點。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有侷限性，也有各自的獨到之處，允許多樣理論和方法做良性競爭與合作，有助科學文明的創造發展（Feyerabend, 1975）。

三、其後的著作延續對單一理性的批判觀點

Feyerabend 在 1975 年提出「怎樣都行」的多元主義方法論之後，他延續對單一理性的批判觀點。Feyerabend 認為單一理性權威是科學傳統裡的理性主義所構成，而單一理性反而會成為科學研究進步的限制，因這些理性主義的規範會限制研究者研究的自由，而使得科學不能自由的發展；而在整個社會裡，則會因為科學傳統被這些理性主義者強加的理性基礎，而使得其他傳統的自由發展受到限制。因此 Feyerabend 認為在理性主義者的主張之下，社會將會變成非常單一的科學霸權主宰狀態，且這種科學已不復是以往那種「充滿自由精神的科學」，而是由一種死板的教條主義所主導的科學，因此 Feyerabend 才會極力的反對任何規範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原則，他相信這些原則只會妨礙科學的發展與進步。就如他在《反對方法》的第一章中就明確的指出：「無論考察歷史插曲，還是抽象地分析思想和行動之間的關係，都表白了這一點，那就是唯一不禁止進步的原則就是怎麼都行。」（Feyerabend, 1975, 頁 14）

1987 年他在《告別理性》一書中對「理性」做了歷史學上的比較研究，引出更深一層的批判：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理性」本身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且在不同歷史時期會有不同的定義，理性的定義在人類歷史中持續在變動，例如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愛利亞學派（Eleatic School）的奠基人和領袖的巴門尼德（Parmenides of Elea）把「理性」定義為單純的「思維」，而把豐富多彩的「感覺」定義為「非理性」，時間推移到中世紀，在當時宗教與政治文化的強力影響下，對教義、教條和聖經的忠誠定義為「理性」，如對教義、教條和聖經不忠誠，則被定義為「非理性」。而時間來到近代，在哥白尼和伽利略之後，人們把「科學」定義為「理性」，把「非科學」定義為「非理性」，當 Feyerabend 比較與整理上述個別歷史時期的理性定義，發現理性有

兩種特徵，第一為獨斷性和程序性，第二則為單調性和齊一性，他認為當「理性」代表「永恆規則」與「普遍秩序」時，也會同時壓制人類最珍貴的「創造性」、「多樣性」和「自由性」（Feyerabend, 1987）。1988年 Feyerabend 更直接的批判西方科學對傳統知識的傲慢態度：

「我感到憤怒的是，我們大家可以從中學到東西的文化成就遭到恣意破壞，某些知識份子擾亂民眾生活而又無端自信。」（頁 272）

Feyerabend 對於各種傳統知識被看輕、壓迫與歧視感到憤怒，包括原住民的古老知識，每一塊土地上祖先流傳下來的智慧，以及中醫在醫學上的地位等，他反對將各種知識區分高下優劣，而是將多元的知識與智慧靈活運用與整合。

綜上所言，Feyerabend 認為過往的科學霸權，讓人類失去認識多元真理的機會，對人類知識進步、教育發展形成全面性的限制，如果有一種放乎四海皆準的研究方法，Feyerabend 稱為「怎樣都行」的研究方法，他引導我們去思考將科學、神話、傳說等各種領域等量齊觀，歸納、整合不一樣的思潮與技術，看見多元真理的豐富可能。然而，他的多元主義方法論也引發諸多爭議與反對，以下繼續說明他的方法論所面臨的挑戰以及他的答辯。

肆、Feyerabend 方法論面臨的挑戰與答辯

Feyerabend 多元主義方法論並不容易被一般人所理解，因誤解 Feyerabend 的原初觀點，於是 Feyerabend 開始被貼上「論證相對主義者」、「非理性主義者」、「反科學傳統主義者」、「認識論無政府主義」；再者，許多人誤解 Feyerabend 在《反對方法》所主張的「怎樣都行」，並大張旗鼓地口誅筆伐；將此一論點放在為道德教育上，詮釋為「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道德價值失序；或放在教育政策上，認為「鬆綁」而未有適當專業規範，往往流於後現代主義「怎樣都行」的危險；或放在文章寫作上，詮釋為另一種「將拼貼抄襲模仿合理化」的理念。許多學者對 Feyerabend 強調「怎樣都行」的多元主義方法論有各種爭議批判，以下整理相關學者論點，與 Feyerabend 本人的答辯如下：

一、Kulk、Tibbets 與 Hattiangadi 對 Feyerabend

Feyerabend「怎樣都行」觀點一提出時，眾人譁然，許多以重建理性、捍衛理性為己任的學人們紛紛出招挑戰，包含 Kulk、Tibbets and Hattiangadi 陸續挑戰，指出 Feyerabend「怎樣都行」想法是用膚淺化的科學，就算使用再多的理解力也不能理解的神話，但 Feyerabend 為多元主義方法論做辯護，其回應是充滿反諷攻擊性，因一般論者只會去抓其極端性的語言，來做放大攻擊，但很少學人關注 Feyerabend 會這麼說的深層思考點，與其企圖引發何種回應的論辯策略，這些細節反而更引人深思，故產生了不正面直接回答問題的費氏風格，Feyerabend(1975)回應如下：

「怎樣都行」沒有表達我的任何信念，它是我對理性主義者的尷尬處境，所進行的幽默概括。我說，如果你需要普遍性標準，如果在沒有獨立於情況、獨立於世界的形式、獨立於研究的轉折點、獨立於多變獨特性而成立的原則，你就不能生活，那麼我可以給你一個這樣的原則，它將是空洞的、無用的、相當可笑的——但它是一個原則，它就是「怎樣都行」的原則。（頁 214-215）

承上言之，Feyerabend 運用讓對手引起情緒的反諷式語言策略，去彰顯多元主義方法論在真實世界的重要性，也點出普遍性標準對不同科學研究，其所產生的種種限制應該被正視，而不是被刻意合理化忽略。

二、Newton-Smith 對 Feyerabend

質疑的挑戰聲沒有停歇，Newton-Smith (1983) 以《反對方法》做為分析文本提出批判：首先，Newton-Smith 直接指出 Feyerabend 已陷落在邏輯上的「循環論證」（reasoning in a circle），卻毫無自我覺察，這也讓原先批評其觀點、奉嚴格邏輯律的論者們，再次使用邏輯思考去框架、去錯解 Feyerabend 的發言，卻沒有深入檢視 Feyerabend 的論點，這些批評者因嚴守邏輯論述，過於苛求理論內部的「一致性」，反而壓抑新理論成長的空間與時間，無法與 Feyerabend 在同一論述脈絡下進行思考辯論，走上各說各話無交集的狀態；在理論策略上，Feyerabend 的方法論只是消極式的消解與之對立衝突的方法論，最後的目的是以「任何方法論均有其局限性」的最大論述前提做出理論性支持。然而在現實中，科學研究人員在進行研究時，可能不會理睬 Feyerabend，導致他「怎樣都行」的論點似乎相對薄弱，在研究中無法發揮影響力。

三、Curthoys 與 Suchting 對 Feyerabend

另一方面，在理論定位上，Curthoys 與 Suchting 認為 Feyerabend 的方法論，只能代表當代哲學界經驗論與自由主義面臨挑戰的最大意義標誌，在理論問題上，他們認定 Feyerabend 陷於經驗論的困境中，仍停留於某種攻擊理論的意識型態，而 Feyerabend 的「怎樣都行」理論，雖然提出「自由化」與「多元化」作為這個循環的二項重要指標，但「怎樣都行」與「自由化、多元化」兩者卻陷入弔詭關係：若要「怎樣都行」則不需「自由化」與「多元化」；若需要「自由化」與「多元化」則如何「怎樣都行」？Curthoys 與 Suchting 認為，「怎樣都行」對於科學研究的本質、倫理學政治理論都不具重要性，但它足以對當代經驗論和自由主義的危機提出警示。面對上述質疑，Feyerabend 回應說「自己是故意的」，在學術論辯策略上，利用「自由化」與「怎樣都行」兩者概念上的謬誤加以論證，藉此反諷單一邏輯推論上的問題。不論是「自由化」、「多元化」與「怎樣都行」的論辯爭議，都必須回到 Feyerabend 認為「怎樣都行」是其反對任何方法論的根本原因。因為 Feyerabend 認為若我們相信所居住的世界是一個無限的穹體，則現在雖然看起來有些方法論比其它的方法論好，但是我們怎麼知道這就是最佳的方法論呢？我們怎麼能知道這些方法論所提供的方法一定能夠幫助我們發現某些深藏的自然奧密呢？因此保持一種方法論的開放性絕對是必要的 (Feyerabend, 1996)。承上，Feyerabend「怎樣都行」的提出，實質包含了原先要展現「自由化」與「多元化」促進科學研究的正向發展，另一方面，Feyerabend 多元主義方法論要確保方法論保持動態性、開放性、包容性，而具備動態性、包容性與開放性的方法論便是原先「自由化」、「多元化」的理論發展目標，且因人類還有許多現今科學研究水準無法分析與詮釋，目前也沒有絕對最佳的方法論，故 Feyerabend 聚焦於保留可找到最佳方法論空間的「怎樣都行」，便成目前最好的選擇之一。

四、Agassi 對 Feyerabend

Agassi 認為，人類知識應該是透過程序性步驟化，有秩序的理性研究，經過理性的判斷和不斷透過研究的過程，逐漸累積而成的文明成果，而 Feyerabend 的方法論，大大違背了傳統科學家長久堅持的理念，而 Agassi 在和 Feyerabend 通信過程中，Agassi 就對 Feyerabend(1975)直接說：

「只有『無賴和蠢人』才會建議把巫毒教 (Voodoo) 和占星術引進『州立

學院和大學』。」（頁 42）

Agassi 明顯地帶著不當的輕視態度，認為 Feyerabend 把「怎樣都行」的多元主義方法論帶進學院與大學，不如把巫毒教、民間醫學、占星術、祈雨舞儀式等不合現代科學標準的知識帶入大學，他一方面嘲諷這些民間傳統知識不符合現代性理性與科學的標準，另一方面批評 Feyerabend「怎樣都行」的概念是對社會大眾譁眾取寵的愚蠢之舉。當 Agassi 再度向 Feyerabend 質疑，他並沒有對「怎樣都行」做出更具完整性、周全性、更能說服眾人的哲學論證，Feyerabend 在《自由社會中的科學》一書予以回應，其書中常常可看到出現「矛盾」或「不一致」等現象。幾乎每一個批評者都作出了類似的評論，但這些人沒有一個能解釋為什麼應該嚴肅地對待不一致？不一致到底有什麼錯？Feyerabend(1978)也坦誠表示：

我沒有嘗試去強調「相對主義的極端形式」是正當的，我並沒有試圖去替每一種情緒、每一種不能解釋的奇異狂想，和每一個人的思考自主性進行辯護，我只論證說，在通向相對主義的道路還沒有被理性所完全封閉，所以理性主義者不能反對任何人加入相對主義。（頁 203）

雖然 Feyerabend 個人認同『多元性』在思想、方法、生活方式會產生重大影響，但直到現在，Feyerabend 尚未嘗試經過哲學論證來支持證明此一信念，反其道而行，Feyerabend 運用了一種否定性論證，這樣的否定論證，帶來的答案是理性的科學不能缺少，不能排除多元性、理性、科學與民主三者的互動關係，理性與科學，都還沒有強大到可以把限制強加在最珍貴的民主，去停止人們把各自珍惜愛護的傳統價值，帶入民主之中。所以 Feyerabend 提出「怎樣都行」，是要讓各種不同的言論，多元層次的真理，各自遊戲的思想，都有出場被人們看見的機會（Feyerabend, 1975），亦即 Feyerabend 是反對理性主義者所灌輸的科學知識霸權之意識形態，但他不是為反科學而反科學，因為他肯認在人類歷史中科學已取得許多卓越性成果，科學對人類的貢獻無法抹去，但同樣不能抹滅宗教與神話、各類非科學對人類的貢獻，因為科學的許多成果得益於非科學或宗教神話。亦言之，被理性主義者奉為絕對上位的科學，其所做的貢獻有部分來自理性主義者刻意忽視、輕視的非科學知識和宗教神話，而

Feyerabend 認為目前的科學成果也不能證明科學的優越性，而他直言只有以下這二個命題都成立時，才能證明科學發展的成果較其他傳統優越。第一個命題是任何其他傳統從未產生過可與科學相比的東西；第二個命題則是科學的成果是自主的，它們沒有受益於其他非科學的傳統 (Feyerabend, 1978)，總之，Feyerabend 放大此反差現象，希冀專家同行、知識界人士、社會大眾能正視這樣長久以來的不合理現象，還給其他類型知識與文化一個更平等的對待。

綜上所述，上述學者一再誤解 Feyerabend 所強調「怎樣都行」的本質意義，一開始是放在討論「研究方法論」的脈絡上，而 Feyerabend 所謂「科學研究方法論」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stic theory of science)，是主張多元主義方法論，是一種尊重多元、容忍異己、強調創新的研究精神，而 Feyerabend 也強調無政府主義認識論，是克服一切理性主義的科學發展模式，這也為科學發展所造成的束縛，提出化解問題的對症良藥。在諸多批評之後，也是 Feyerabend 《反對方法》出版六年後，Checkland 在 1981 年提及，傳統科學研究方法的確有所侷限，他同 Feyabend 一般，質疑傳統科學方法在走出實驗室後，沒有足夠能力說明真實世界中錯縱複雜的現象 (Checkland, 1981)，他的論點也呼應了 Feyerabend 的觀點。

伍、Feyerabend 多元主義方法論對教育的啟示

Feyerabend 的多元主義方法論帶來顛覆性進步式思考，但仍是有些論者把 Feyerabend 所說「怎樣都行」和「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做化約式的等號，然後再群起攻之，又說要排斥此一爭議性言論，卻完全忽略 Feyerabend 當初提倡「怎樣都行」多元研究方法論的情境脈絡。接著，研究者提出 Feyerabend 多元主義方法論對教育研究者與教學者的啟示：

一、Feyerabend 多元主義方法論對教育研究者的啟示

從 Feyerabend 的「怎樣都行」論點提出後，教育研究者可以反思的是，現代科學理性與形式邏輯推理極為重視不容有矛盾存在的「一致性」，這是其理論的最大優勢，卻也同時是其理論的最大限制，形式邏輯推理 (formal logic reasoning) 的思考如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故 Feyerabend 表示形式邏輯對於「一致性」的要求過於嚴苛，將會壓抑甚至毀去邏輯推論原先所代表的理性生命力。德哲學家黑格爾所開創的辯證邏

輯，即懂得包容矛盾的可能存在的情況去開展理性生命力，由上觀之，在 19 世紀時空的黑格爾，是有其先見之明與深謀遠慮（Feyerabend, 1975），而在人類科學發展史的發展過程裡，我們看到許多跨時代理論也並非都完全是符合形式邏輯，認定何為絕對真理之規則，能夠排除毫無異質性矛盾狀況的存在狀況，在追求學術真理的路途，有時當我們會陷入形式邏輯的知識迷障，當此時刻，也可以思考一下懂科學理論邏輯，但不被其所限制的 20 世紀理論物理學巨人，開創「相對論」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為什麼會說：「想像力遠比知識更重要。因知識有限，想像則無限，它包含一切，推動著進步，為人類進化的源泉。」（高涌泉，2003），以及這句話背後，想要告訴教育學術界後進們的意義是什麼？

Feyerabend 讓不論是研究者與教育者看到另一個新視野，科學家發現的是「現象」，至於理論則是人的「發明」；任何理論本身都有其限制，不能宣稱是真理。換言之，如果現代科學家、理論研究者與教育工作者，真的對科學本身性質比較了解，就不會陷入泛科學主義的窠臼，更不會流於教條主義。

更具體的來說，如何使用 Feyerabend「怎麼都行」原則來突破這些在教育研究者中，長久以來「一元化」、「單向理性」的問題。例如在台灣高等教育政策中「大學評鑑」與「大學教師評鑑政策」上，單方面只採用 SCI、SSCI、EI 發表量作為評分的一元理性、單向的大學評鑑、大學教師評鑑的制度，但卻產生了許多扭曲的現象。例如台灣的大學教師工作包括研究、教學、服務、輔導等項目，但大學教師評鑑制度卻多偏重於獎勵研究卓越的老師，忽略了其他三項同樣表現傑出的教師，這種評鑑制度特別以研究論文發表於特定期刊，如 SCI、SSCI、EI 來作為升等依據，卻忽略了大學的根本使命在於教育，如此失衡的評鑑制度，造成大學教師在權衡時間、心力、重要性之後，現實地以研究為主，對教學則採取應付就好的的態度。這樣單一簡化的評鑑標準、僵化的升等機制，扭曲了學術的研究性與創造性，忽視論文的多元與品質，故學者周祝瑛提出批判：與其說 SSCI、SCI 這些指標有社會影響力，不如報紙上一篇讓民眾看得懂的文章。（引自林良齊，2017）。但現今教育部即將啟動「高教深耕計畫」，不論是「全校型計畫」或「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其申請方式都要求獨尊 SCI、SSCI 指標，顯示擇優補助之篩選門檻仍持續複製「一元化」、「單向理性」所造成的問題，持續擴大與加深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現象，這都是長久以來「一元化」、「單向理性」對於台灣的大學評鑑、大學教師評鑑等制度所產生的負向影響、而國際國際評鑑專家、

劍橋大學終身會士 John Green 在 2017 年「台灣高教如何與世界接軌」座談會提到：

「社會科學要與社會科學進行比較，以 3 至 4 個多元指標來評比，透過多元指標才能看到整體的輪廓。」（引自林良齊，2017）。

Green 一再提及台灣的大學評鑑，應使用「多元指標」，因為不同的研究領域要有不同的比較方法，指標必須具備多元性，不能只來自一個供應者，而需非常多樣的評鑑工具，上述一元理性所產生的教育制度問題，從此觀之，更能理解 Feyerabend 「怎麼都行」原則背後重視多元性、多元主義、多元方法論等在教育領域的重要性。

二、Feyerabend 多元主義方法論對教學者的啟示

對教學者而言，Feyerabend 是哲學家，同時也是大學教師，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把年輕人引入生活，培養他們的創新意識，豐富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增加他們自由選擇的機會，在教學過程中，倡導批判式思維、推崇互動式教學、反對教育沙文主義、主張自由學習（張洪雷、張豔萍，2010），而從 Feyerabend 的「怎樣都行」所引發的教育反省，是教育教學者所偏好的理論立場不盡一致，但有一個共同教育立場是必須團結一致，是要一起反對過於僵化，盲信權威的理論教育，因僵化死板、盲信權威的理論教育，會對人類的人格發展與知識發展造成損害限制，從 Feyerabend 在《自由社會中的科學》曾提到一段他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上哲學課時所做的反思，當他在面對一群包括墨西哥人、黑人、印第安人等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時，Feyerabend 問自己：「這是些什麼樣的人？我應該要教他該想什麼和如何去想嗎？我不知道他們的問題，儘管我知道他們有許多問題。我不了解他們的興趣、情感和憂慮，儘管我知道他們渴望學習。哲學家們慘淡經營、矯柔造作，製成了枯燥乏味的產物，一些人再給它們堆砌上華麗的詞藻，使之取悅於人。拿這樣的東西給這些人適合嗎？這些人已被剝奪了鄉土、文化與尊嚴，現在他們又被認為應當首先學習這些擄掠者的貧乏思想。」（Feyerabend, 1990, 頁 162-163）

Feyerabend 在大學為大學生上課時，不斷在反思一個大學老師到底能夠教給大學生什麼？應該教給大學生什麼？這兩個問題也是作為一個知識論者容易忽視的問題，同時，Feyerabend 意識到在大學教導來自不同文化傳統的大學生們，不是用所謂單一理性、科學霸權與大學老師即學科知識權威的角度來進行標準化教學，而是需要看到這些學生的各種差異，接受不同文化傳統背景下的學生提出不同觀點，分享不同的生

活經驗，營建安全、開放、自由、多元言論的大學教室空間，才有機會正確提升學生在想像力、學習能力的正向表現，我們必須建構一個鼓勵發言、不貶低任何言論的自由環境，一個可以接受異議的教學空間，因為現在身處邊緣位置的異議，可能是未來的主流典範。教學者需要勇於改變，讓自己處於不斷變動的進步狀態，因為知識必然成長於變化，也帶來人類文明進步，僵化權威的教育會使知識停止向前向上成長，因為權威不但帶來僵化，也帶來更可怕自我中心霸權思維，因為單一權威，只合理化一種類型的知識文明，會讓人類整體的多元文明發展有向後退，再次造成僵化，弄到最後變成無知，無知所犯的錯可能帶來人類其他生存危機。為了防止這些負向循環的不斷發生，經 Feyerabend 的「怎樣都行」所帶來的批判性思考才能讓科學知識持續的正向成長，也讓教育能真正培養出，可隨時面對全球化社會的變化，掌握大時代趨勢，不盲目從眾也不隨波逐流，如同 Feyerabend 的思想行動一般，勇發抗世之言的獨立思考者。

Feyerabend(1999)以大學教學者的身分，針對大學課程進行批判性的反思

當代許多大學課程是以一種完全是獨斷的方式進行著，考察被設計成不是檢測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而是掌握一種教義到何種程度，而這樣的掌握被認為是唯一重要的事情。難道不是這樣嗎？甚至物理學的課本經常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寫：他暗示我們已經具有最終的真理，雖然可能在某些技術性的細節上尚須改善，但它的基本原理是無可懷疑的。難道不是嗎？至少在一些地方，根本不同的敘述遭到懷疑，甚至更糟的是，把他們視為多餘的，毫無理由地擾亂因遵循真理的發現而帶來寧靜。難道大學裡許多事不是被設計成脅迫或更多地接受所提供的東西嗎？（Feyerabend, 1999/2006, 頁 49）

承上論之，Feyerabend 看來，一種獨斷式觀點需要極權主義制度的支持，或者制度的主要功能是維護它主要的教義，保護它免受那些認為需要不同方法的人的攻擊，此一觀點會使用獨斷式教學，因此會嚴重削弱年輕人的想像力，而獨斷式教學方式使傳授者成為完全的權威，學生缺乏知識讓他們不能對傳授者所講的事物做出判斷，因是完全被動的，一種教條化的教學方法。這種把教學視為單向進行的做法，既不切實際，又是有害的。之所以不切實際，是因為它把鼓勵或引進才智發展的環境看得太簡

單了；它之所以有害，是因為獨斷灌輸，必定以犧牲我們的人性為代價，來提高職業的條件，而 Feyerabend 對教學者所期待的，無非就是一個廣闊的胸襟，不墨守成規、願意聆聽學生的多元意見，甚至願意容許唱反調、提出相反建議的學生，如此才能接近真理。

綜上所述，本文最終目的希冀透過研究 P.Feyerabend 的後現代研究方法論提出對教育的啟示。除了說明 Feyerabend 的多元主義方法論，檢視他與其他學者的爭論，最後對於教育研究者與教學者提出建言。Feyerabend 在引進教育界之時，他所主張的「怎樣都行」的理論特別受到教育學界許多的誤解，進行口誅筆伐的盲爭，但卻一再忽略 Feyerabend 所強調「怎樣都行」的本質意義，一開始是放在討論「研究方法論」的脈絡之中。研究者透過梳理他的思想與爭論，提出在教育理論上，沒有一種先驗式的、霸權式的絕對真理，也沒有任一方法可以獨斷地宣稱自己是真理檢證的絕對標準，我們需要提供一個可以接受異議、包容多元、兼容並蓄各方意見的教育研究環境；對教學者來說，研究者建議突破灌輸式、獨斷式教學，創造讓學生敢於發言的環境，容許異議的聲音，唱反調的學生，指出知識上的獨斷錯誤，才能一步步靠近真理。

透過梳理 Feyerabend 的研究，對教育界、學術界最大期許為教育研究者與教學者共同攜手形塑一個讓不同異議的論述，有其各自遊戲，交流對話的空間環境，因這樣異質性高的論述可能是未來的思想主流，讓包容多元與尊重差異，不只是口號，去落實於現實的學術與教育生活裡，也讓新進的、異質性高的研究新生命力、教學新生命力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讓教育界、學界的多樣性活力，從此正向循環生生不息。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 王秋絨 (1997)。《成人教育的思想與實務：現代、後現代的論辯》。臺北：心理出版社。
- 老礮 (1988)。《後現代建築》。臺北：揚智文化。
- 何政廣 (1994)。《歐美現代美術》。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 高涌泉 (2003)。《另一種鼓聲：科學筆記》。臺北：三民。
- Feyerabend, P. (1990)。《自由社會中的科學（結構群）》。臺北：結構群。（1978）
- Feyerabend, P. (1992)。《反對方法：無政府主義知識論綱要（周昌忠）》。上海：上海譯

- 文出版社。(1975)
- Feyerabend, P. (2005) . *自由社會中的科學* (蘭征) .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
- Feyerabend, P. (2006) . *無根基的知識：知識、科學與相對主義* (陳健) . 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 Feyerabend, P. (2002) . *告別理性* (陳健) . 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1987)
- 洪子偉、鄧敦民主編 (2019) 。 *啟蒙與叛逆：台灣哲學的百年浪潮* 。台北：台大出版中心。
- 張洪雷、張豔萍(2010) 。 *批判、互動與自由選擇——費耶阿本德教育哲學思想研究* 。 *湖北社會科學* , 12 , 109-111 。
- 楊深坑 (1996) 。 *現代化與後現代思潮衝擊下的師資培育* 。載於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 (主編) , *教育：傳統，現代化與後現代化* 。 (頁 165-188) 。台北：師大書苑。

外文部分

- Cole, P. & O'Riley, P. (2002). *Much Rezadieux about (Dewey's) Goats in the Curriculum : Looking Back on Tomorrow Yesterday* . In W.E. Doll & N. Gough (Eds.) , *Curriculum visions* (pp.132-148) . New York : Peter Lang .
- Checkland, P. (1981). *Systems thinking, systems practice*. Chichester: John Wiley.
- Feyerabend, P. (1975). *Against method: 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 London: New Left Books.
- Feyerabend, P. (1978). *Science in a free society*. London: New Left Books.
- Feyerabend, P. (1987). *Farewell to Reason*. London: Verso.
- Feyerabend, P. (1998). *Against Method*, New York: Verse.
- Pinar, W. F., & Grumet, M. R. (1976), *Toward a poor curriculum*, Dubuque, IA: Kendall/Hunt.
- Feyerabend, Paul (1996). *Killing Time: The Autobiography of Paul Feyerabe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Knight, G. R. (2008). *Issues and Alternatives i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4th ed.). Berrien Springs, Mich.: Andrews University Press.
- Newton-Smith, W. H. (1983),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 Balliol College, Oxford

P.Feyerabend (1924-1994) 的後現代研究方法論戰對教育的啟示

Pinar, W. F., & Grumet, M. R. (1976), *Toward a poor curriculum*, Dubuque, IA: Kendall/Hunt.

Richardson, L. (1994). Writing: A Method of Inequity. In Denzin Norman, K. & Lincoln. Gvanna, 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Usher, R., & Edwards, R. (1994). *Postmodernism and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A Commentary on the Debate between Modernist and Postmodernist Research Methodology View Of Feyerabend (1924-1994) and its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Tien-Tai Chang* Shu-Mei Chang**

Abstract

Paul Feyerabend (1924-1994) published the book "Against method" in 1975. It contained Feyerabend's controversial "anything goes" viewpoint, which caused other scholars to question and challenge Feyerabend. And the main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clarify the stereotypical misconceptions about post-modernist methodology and Feyerabend's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Since "anything goes" is no method at all, it followed that either we should follow a method that is not a method or reject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Thus, this study adopts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method and dialectics. Finally, there are four themes : first, the explanation of what is meant by "postmodernism of methodology"; second, the clarification of Feyerabend's view of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 third, the challenges and replies of Feyerabend's methodological pluralism, four, the discussion of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Keywords: anything goes, Feyerabend, postmodernism of methodology

* 1st Author: Lecturer , Faculty of Teacher Education, Yangtze Normal University

** 2stAutho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Email: knightchang24@gmail.com

P.Feyerabend (1924-1994) 的後現代研究方法論戰對教育的啟示